

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调查问卷分析

田晖 朱璐 黄哲
中南大学

摘要 为深入探讨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 本文对长沙市有关企业数字创新技术的应用现状、企业对数字创新技术支持政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与实践、企业应用数字创新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企业对政府推进数字创新支持政策建议以及进一步应用数字创新技术的实践措施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基于 635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企业数字化处于初级阶段, 以大数据、AI 应用为主, 场景“实用导向”, 应用主要受制于人才不足和技术适配性弱; 企业对相关支持政策了解有限, 评价偏正面但反映政策宣传不足、申请较难; 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与政策一致, 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与人才引进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创新在生产智能化和决策优化上成效显著, 而对价值链数字化的推动仍有提升空间; 企业多期望获得技术补贴、税收减免等财政支持; 企业未来计划通过引入 AI 模型、搭建智能平台、引进人才等方式深化数字创新。最后, 本文为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系统性深度融合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长沙市; 企业; 数字创新; 经济高质量发展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202>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6.0801.20-2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此国家战略导向下, 探究数字创新如何具体赋能微观企业主体, 并最终聚合为区域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创新赋能湖南省绿色转型: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2024JJ5454); 长沙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沙市数字创新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kq2402245)。

作者简介: 田晖, 女, 1969 年 3 月出生, 湖南岳阳湘阴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江湾楼商学院 425 室, 邮政编码: 410012, Email: tianhui0322@csu.edu.cn。朱璐 (通讯作者), 女, 2003 年 8 月出生, 福建厦门人, 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江湾楼商学院, Email: luciaz03@163.com。黄哲, 男, 2001 年 8 月出生, 浙江金华人, 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江湾楼商学院, Email: 241611053@csu.edu.cn。

© The Author(s) 2026. CC BY-NC-ND 4.0.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10 December 2025; Accepted: 25 December 2025; Published: 15 January 2026.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ISSN 2664-1747 (CD-ROM).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CPCL®). 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 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有限公司进口。Email: cpcl@cpcl.hk,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本研究将聚焦于湖南省会长沙市这一具体的地理空间。长沙市不仅是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与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增长极，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地处中部，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数字要素的流动与创新资源的集聚提供了天然沃土。同时，长沙正着力打造以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集群，这些产业本身正经历着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升级与服务化转型的深刻变革，使得长沙成为观察企业数字创新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互动机理的理想样本。然而，尽管数字创新的宏观价值已成共识，但其在企业内部的具体渗透、采纳与应用过程，尤其是其如何转化为切实的发展绩效，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打开的“黑箱”。对此，本研究采用基于问卷调研的分析方法，对长沙市范围内不同行业、规模与所有制企业的多层级员工进行系统性抽样调查。问卷设计紧密围绕“个体与企业特征—数字创新认知与应用—高质量发展成效与挑战”的逻辑链条展开，通过获取一手微观数据，旨在构建一个更具动态性与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揭示了数字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传导机制与边界条件，丰富基于中国本土情境、特别是中部重要增长极城市的数字化转型理论；在实践层面，不仅能直接依据调研发现企业实际面临的困难、挑战与政策需求，为长沙市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精准化、差异化的政策优化依据，也能为企业管理者理解内部认知差异、破解创新应用瓶颈，以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文献综述

数字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核心观点聚焦于影响机制、协同特征与实践效应等方面。杨玉敬^[1]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数字创新韧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U”型非线性影响，要素结构转型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甄俊杰等^[2]认为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匹配度决定发展质量，二者协同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丁仕潮等^[3]则指出数字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并且存在空间差异性。徐君等^[4]研究表明数字创新通过微观、中观、宏观多层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技术、数据、人才等方面存在多重现实困境。

在传导路径与政策效应研究中，宋洋^[5]强调数字经济通过直接与间接效应推动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起到重要中介作用。程显宏等^[6]指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创新存在时滞效应。郑浦阳等^[7]证实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数字创新要素配置发挥“U”型调节作用。李佳慧等^[8]验证数字经济政策可通过要素激活和基建驱动等路径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政策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与空间溢出特征。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影响机制与区域异质性分析，对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创新、政策工具等因素探讨充分，为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目前研究针对微观企业内部多层级员工对企业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之间内在关系认知的研究较少，尚未打开数字创新在企业内部落地的“黑箱”。基于此，本文聚焦长沙市，以长沙市不同类型企业的多层级员工为研究对象，深度探析数字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关联，为数字创新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三、问卷调查设计与开展

（一）问卷设计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的问卷设计紧密围绕“企业数字创新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问卷主要由卷首语、受访者基本信息与主体调查内容三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卷首语。其主要目的是向受访者清晰阐明本调查的学术性质、核心主题及数据保密承诺。

通过引导受访者基于其所在企业的真实情况进行作答，试图从源头上提升问卷填答的专注度与数据的有效性。

第二部分旨在采集受访者及其企业的基本信息。这部分涵盖了个人层面（如年龄、学历与职位）与企业层面（如所属行业、规模、成立年限与所有制性质）的关键变量。收集这些信息，主要是为了在后续分析中，将它们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或分组依据。这些信息会用在后续样本特征的分类统计里，帮助区分不同群体的反馈差别，提升调研的有效性。

第三部分是问卷的主体，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以系统探究核心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内容与对应题项如下：

（1）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技术的应用现状（（第 8-12 题）：包括对应用程度、具体技术类型、主要领域、效果感知及面临困难的评估，旨在刻画企业数字创新画像。

（2）企业对数字创新政策的认知与评价（（第 13-15 题）：关注政策环境，观察企业能否了解并运用长沙本地的支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在他们看来的有效程度。

（3）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与实践（第 16-19 题）：主要考察企业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解，及其在运营中采取的相关举措与遭遇的挑战。

（4）数字创新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评估（第 20-21 题）：主要测量数字技术在具体业务环节中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与整体贡献度。

（5）企业对政府推进数字创新政策的建议（第 22、24 题）：以开放题的形式征集企业人士对未来政策优化方向的具体意见与诉求。

（6）企业深化数字创新应用的规划措施（第 23 题）：了解企业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方面的未来部署与战略意向。

（二）调查开展与样本情况

本次调查于 2025 年 6-11 月期间开展，具体步骤如下：

预调查与修订：在正式发放前，对 20 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人士进行了小规模预测试，根据其反馈对问卷的表述清晰度、选项完整性和答题时长进行了优化调整。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项目问卷	受访者数据结果 (n=635)
年龄	30 岁以下 (34.02%); 31-40 岁 (46.77%); 41-50 岁 (15.91%); 50 岁以下及以上 (3.31%)
结构	大专及以下学历 (11.5%); 本科学历 (60.79%); 硕士学历 (26.46%); 博士学历 (1.26%)
行业	制造业 39.84%; 服务业 32.6%; 金融业 12.28%; 建筑业 5.67%; 其他（信息技术业、教育业等） 15.28%
职位	普通员工 (50.87%); 部门经理/副经理 (31.34%);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 (12.91%); 董事长 (2.99%); 其他 (1.89%)
成立年限	1-5 年 (18.43%); 6-10 年 (21.73%); 11-20 年 (22.52%); 20 年以上 (36.85%); 其他 (0.47%)
企业规模	20 人以下 (14.17%); 20-299 人 (27.72%); 300-999 人 (16.54%); 1000 人以上 (40.47%); 其他 (1.1%)
所有制性质	国有/国有控股 (40.31%); 民营 (43.46%); 外资 (7.09%); 混合所有制 (7.24%); 其他 (1.89%)

渠道与方式：通过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线上通过“问卷星”平台面向长沙市企业从业者定向推送，线下渠道调查对象主要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和高级管

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员群体。线上线下发放的问卷共计 738 份，回收有效答卷 635 份，回收率 86.4%。

从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受访者方面，以中青年（31-40 岁占 46.77%）、高学历（本科及以上占 88.5%）群体为主。普通员工占 50.87%，部门经理及以上管理者占 47.24%，兼顾执行与决策视角。企业方面，行业以制造业（39.84%）和服务业（32.60%）为主，金融业占 12.28%，其余为建筑、信息技术等行业。企业规模覆盖全面，1000 人以上大型企业占 40.47%，20-299 人中小企业占 27.72%。所有制以民营（43.46%）和国有/国有控股（40.31%）为主。成立 20 年以上企业占 36.85%，6-20 年企业合计占 44.25%，涵盖不同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样本在年龄、学历、职位、行业、规模、所有制与成立年限等维度分布合理，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长沙市企业在数字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中的特征。

四、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一）长沙市数字创新技术应用现状分析

根据问卷第八题结果，将“非常低”、“低”、“一般”、“高”、“非常高”五个选项依次赋值为 1-5，统计结果显示：选择非常低的样本有 105 份，占比 16.5%；选择低的样本有 174 份，占比 27.4%；选则一般的样本有 255 份，占比 40.2%；选择高的样本有 66 份，占比 10.4%；选择非常高的样本有 35 份，占比 5.5%。均值越接近 5，整体应用程度越高，而长沙市数字创新技术应用程度的均值为 2.61，且选择应用程度一般及以下的样本量达到了 84.1%。同样将问卷第十一题结果进行上述处理后可知，长沙市企业在应用数字创新技术提升运营效率的均值为 2.35，这说明长沙企业对“数字创新提升运营效率”的整体感知偏负面，超半数企业认为效果“不明显/非常不明显”，仅少数企业感知到“明显/非常明显”。上述结果说明长沙市多数企业数字化处于初步阶段，同时高程度应用的企业较少，数字化渗透不深，企业对数字创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感知弱。

在应用多种数字创新技术层面，如图 1 所示，问卷结果呈现出两个核心特征，一是技术应用“双核心”：大数据分析 + 人工智能是主流，二是技术应用呈“梯队化”：基础技术普及，前沿技术渗透弱。具体来说，首位的大数据分析选择率为 69.0%，是长沙企业数字创新的第一核心技术，这类技术适配“生产数据统计、客户需求分析”等基础场景，投入低、落地快，符合多数企业的数字化起步需求。人工智能选择率为 56.9%，仅次于大数据，是第二核心技术，结合长沙以制造业（工程机械、汽车）为主的产业特征，人工智能可能多用于“生产质检、设备故障预测”等场景，适配本地产业生产需求；区块链（20.9%）、其他（6.9%）技术的应用程度不高，这可能是因为区块链更偏向金融、供应链溯源场景，而本地企业需求较少，因此应用率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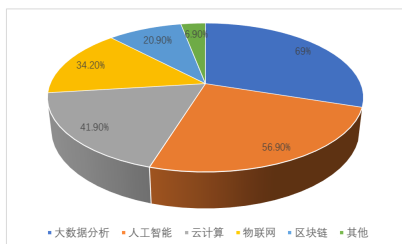


图 1：长沙市企业应用的数字创新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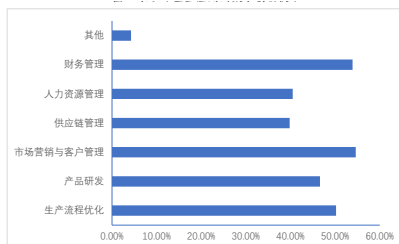


图 2：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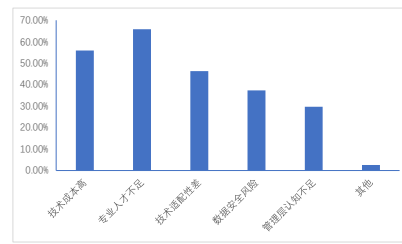


图 3：长沙市企业在应用数字创新技术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细化到应用领域层面，调查问卷结果如图 2 所示，长沙市企业的应用领域聚焦“业务端 + 管理端”，形

成“三核心”：市场营销与客户管理（54.6%）、财务管理（53.9%）、生产流程优化（50.2%），这三个领域的选择率均超50%，是长沙企业数字创新的核心场景，而产品研发（46.6%）、人力资源管理（40.5%）、供应链管理（39.8%），选择率均低于50%。所有高选择率的领域（营销、财务、生产）均是“投入见效快、直接关联企业核心利益（增收/降本）”的场景；产品研发选择率较低体现了数字化投入不足，反映长沙企业“创新研发的数字化深度不够”，而供应链管理选择率相对低，可能因为长沙企业供应链本地化程度高（协作复杂度低），数字化需求偏弱。长沙市企业应用数字创新技术场景的“实用性导向”明显，实用性诉求突出。

最后在企业应用数字创新技术所遇到的困难层面，调查结果如图3显示：专业人才不足（选择率65.8%）成为首要障碍，技术成本高（选择率55.9%）和技术适配性差（选择率46.3%）成为次要障碍，而数据安全风险（选择率37.3%）和管理层认知不足（选择率29.7%）这两类问题所造成的阻碍相对较少。结合前文分析，一是超6成企业认为“专业人才不足”是核心困难，这与之前数字创新技术应用程度不高、提升运营效率弱的结果直接关联——人才短缺会导致数字化技术“落地难、用不好”，进而拉低效率效果；二是近56%的企业提及“技术成本高”，说明数字化的投入是企业的重要负担，尤其中小企业可能因成本限制，仅能选择低程度的数字化应用；三是接近半数企业认为“技术与自身业务适配性差”，反映市场上的通用数字技术难以匹配长沙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个性化场景，导致技术落地后效果打折扣；四是相对来说长沙市企业数字化的认知类障碍影响较小，管理层认知不足的选择率仅29.7%，说明长沙企业数字化的“顶层动力”相对充足，核心痛点并非“不想做”，而是“缺人才、缺资金、技术不适配”的“落地难”问题。

（二）长沙市企业对数字创新技术支持政策的认知与评价

问卷数据显示，在长沙市企业对政府数字创新技术支持政策的了解程度方面，尚有超过68.79%的企业对政策了解程度为“一般”或以下，仅有10.39%的企业“非常了解”，说明目前有关于数字创新的支持政策信息宣传还不够到位，存在明显缺口。在企业申请数字创新支持政策遇到的困难方面，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53.39%的企业表示缺乏专业指导，有近半数企业认为政策信息不透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有44.88%的企业认为申请流程较为复杂，36.06%的企业反映审批周期过长，说明政策申请流程与审批效率有待提升。此外，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认为政策申请所需要的资质要求过高，这显示政策设计存在较高的门槛，可能会阻碍中小企业的参与。具体调研数据和结果如图4所示。在企业对数字创新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方面，整体的评价偏正面，有超过55%的企业认为数字创新支持政策的帮助效果“非常大”或“大”，但有44.88%的企业认为帮助效果“一般”或“小/非常小”，说明政策效果未完全释放，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部分企业可能因政策申请困难而未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因此无法得出评价，与实际结果有些差距。

（三）长沙市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与实践

在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方面，根据调查结果可知，有超过70%的企业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驱动、生产效率提升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三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有65.51%的企业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更加平稳合理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诠释，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与政策导向高度一致，说明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较为全面和深入。在企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方面，均有72.91%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投入或管理效率优化的方式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有52.13%的企业通过提升品牌价值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有50.87%的企业通过高端人才引进的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46.61%的企业将绿色低碳转型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措施。可以得出目前长沙市企业比较重视技术优化和人才引进，注重长期竞争力构建。

（四）长沙市数字创新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

在数字创新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方面，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将数字技术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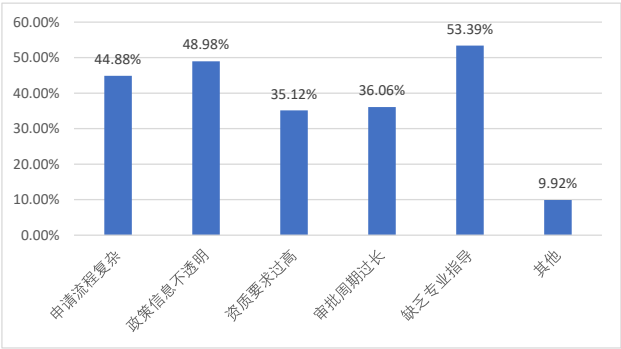


图 4: 长沙市企业申请数字创新技术支持政策遇到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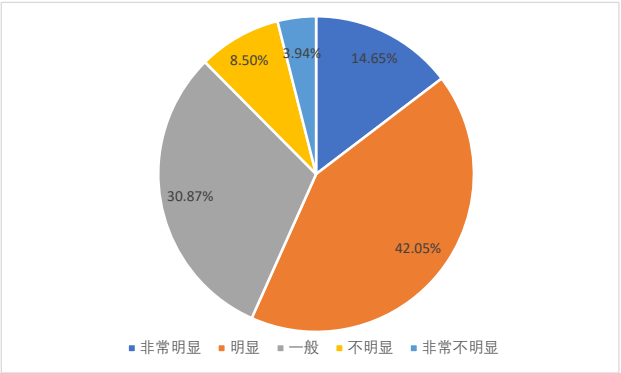


图 5: 长沙市数字创新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

用于决策优化和生产智能化，这显示数据驱动的决策优化和生产流程智能化是主流应用。而有 36.06% 的企业将数字创新技术应用于绿色低碳管理，说明绿色低碳应用处于起步并上升的阶段。另外有 46.3% 的企业应用数字创新技术进行供应链数字化，还有 35.91% 的企业将数字创新技术应用于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可以看出供应链和产品管理数字化进程中等，企业在价值链数字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在数字创新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果方面，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数字创新技术整体的应用效果较为积极，有 56.7% 的企业认为数字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或“明显”。而有 30.87% 的企业认为效果“一般”，说明数字创新技术应用程度还不够深入，这也与数字创新技术支持政策宣传不够、申请困难有关。还有 12.44% 的企业认为效果“不明显”或“非常不明显”，这可能与企业内部的技术适配、人才不足或资金短缺等因素有关。具体调研数据和结果如图 5 所示。

（五）长沙市企业对于政府推进数字创新技术的建议分析

根据问卷收集结果显示，期望得到“财政资金支持（如技术研发专项补贴）”的有 432 人，占比 68.03%；期望得到“税收减免等财政支持”的有 361 人，占比 56.85%；期望得到“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中介服务体系（如数字化转型咨询服务、人才培养、技术指导等）”的有 337 人，占比 53.07%；期望得到“专项贷款支持（如担保贷款、贴息贷款、低息贷款等）”的有 299 人，占比 47.09%；期望得到“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如简化申报流程等）”的有 265 人，占比 41.73%；期望得到“建立完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如加强数据安全法规等）”的有 259 人，占比 40.79%；期望得到“搭建产学研平台，设立上级示范基地、技术中心等”的有 234 人，占比 36.85%；期望得到“其他（如合作交流）”的有 19 人，占比 2.99%。综上数据可以看出，近 7 成的受访企业代表希望得到长沙市政府的资金支持，位居第一，希望得到税收减免等财政支持的接近 6 成，排在第二位，这充分表明了企业对于资金支持的迫切需求。具体调研数据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企业希望长沙市政府在深化数字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方面提供的帮助

具体措施	人数	比例
财政资金支持	432	68.03%
税收减免等财政支持	361	56.85%
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中介服务体系	337	53.07%
专项贷款支持	299	47.09%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265	41.73%
建立完善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	259	40.79%
搭建产学研平台，设立上级示范基地、技术中心等	234	36.85%
其他	19	2.99%

(六) 长沙市企业进一步应用数字创新技术的实践措施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企业未来关于深化数字创新技术与高质量发展的融合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 AI 赋能，制造业企业借助 AI 模型监测机床振动、温度等参数，提前预警故障风险，减少生产损耗；在运营端，AI 可优化供应链决策，通过分析市场需求、物流数据等，精准预测库存缺口，避免资源浪费；在服务端，智能客服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快速响应客户诉求，提升服务效率与满意度，让 AI 真正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引擎”。第二是搭建智能共享平台，对内，平台可打通企业各部门数据壁垒，例如将销售、生产、财务数据整合到统一平台，让研发部门实时掌握市场需求，生产部门根据订单动态调整产能，避免“信息脱节”导致的效率损耗；对外，平台可链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合作。第三是引进人才，一方面，针对性引进既懂数字技术（如 AI、大数据）又熟悉业务场景的人才，例如招聘兼具算法能力与制造业经验的工程师，确保技术创新能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搭建“引进 + 培养”双轨体系，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定向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同时开展内部培训，提升现有员工的数字技能。具体调研数据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企业拟进一步应用数字创新技术的实践措施排名前三

具体措施	人数	比例
AI 赋能	174	27.4%
搭建智能共享平台	153	24.1%
引进人才	147	23.1%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结合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对长沙市各类企业、共 635 份问卷情况开展了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

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技术的应用现状表现为“初步渗透、实用导向、落地受阻”的发展特征。具体而言：在应用程度上，长沙市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仍处初期阶段；在技术结构上，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主；在应用领域上，聚焦营销、财务与生产等场景，表现出明确的实用导向；在成效感知上，企业对数字创新效果评价整体偏负面，数字化渗透与成果转化尚不显著。此外，专业人才不足、技术成本高与技术适配性差已成为制约企业数字创新深化的主要瓶颈。

长沙市企业对数字创新支持政策的认知与评价整体呈现“了解不足、申请不畅、效果未完全释放”的特点。具体而言：在政策了解程度上，企业整体了解率偏低，政策信息传递不够精准；在政策申请过程中，企业面临“信息不对称”与“流程不畅通”的双重障碍；在政策实施效果上，虽然整体反馈偏向积极，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长沙市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具有系统性，且在实践上呈现出“技术引领、人才支撑”的特征。一方面，企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理解与政策导向高度一致，普遍关注结构性优化、创新驱动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多重视技术优化和人才引进，构建长期可持续竞争力，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创新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初显，但融合广度与深度仍待提升。具体而言：从应用场景看，企业主要集中在数据驱动的运营优化，而在绿色发展与价值链协同等更深层次领域的数字化渗透率仍然有限；从实施效果看，多数企业认可数字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但仍有四成左右的企业认为效果有限或不明，反映出技术应用的深度仍待加强。

长沙市企业在政策支持方面表现出强烈且明确的诉求，主要集中在资金支持、服务配套支持、平台生

态建设三个方面。企业迫切期望政府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多种方式降低转型成本，同时完善多层次中介服务体系、优化办事流程、强化法律保障，并推动产学研协同与示范平台建设，从而为企业数字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化、可持续的政策支撑。

9 长沙市企业在深化数字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融合方面，聚焦 AI 模型赋能、搭建智能共享平台、构建“引育结合”人才体系三大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构建可持续创新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撑。

（二）建议

基于上述问卷调查结果，为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系统性深度融合，提出以下政策与行动建议：

政企协同建立数字化转型评估体系，通过诊断工具与企业自评明确转型路径和难点，突破人才、技术成本与适配等瓶颈，系统提升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水平。政府可联合第三方机构探索开发适用于长沙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诊断工具，依据评估结果为不同阶段企业提供技术培训、方案咨询与财政补贴等差异化支持，以破解人才与技术适配瓶颈。企业应主动开展数字化转型自评，并基于诊断结果优先聚焦生产和运营中的关键痛点，积极引入适用技术与方案，务实推进数字技术在核心业务环节的落地应用。

政企协同构建“精准推送”的双向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智能匹配、流程简化、专人对接共同解决政策信息不对称与申请难问题，优化数字创新政策环境。政府应整合资源建立长沙“企业数字通”一站式服务平台，实现政策智能匹配、流程精简与进度透明，并设立线下服务专窗提供辅导。企业应指定专人负责政策研究与申报，主动利用政府平台获取信息并参与培训，积极反馈政策申请中的实际障碍，将政策支持融入转型规划，确保政策红利充分转化为发展动力。

政企协同设立产业攻关专项与人才计划，将“技术+人才”的双轮驱动切实转化为长沙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应依托长沙智能制造、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基础，联合龙头企业与本地高校设立关键技术攻关专项与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并提供配套的研发补贴与人才安居支持，为企业系统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政策导向与资源保障。企业应主动参与政府主导的产业创新联盟，对标专项要求规划自身技术升级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并完善内部创新机制与人才“引育用留”体系，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

政企合力拓展数字创新技术在绿色与协同领域的应用场景，提升技术渗透深度，切实将数字创新转化为长沙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竞争力。长沙市政府可围绕工程机械、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设立绿色制造与供应链协同数字化标杆项目，提供专项资金与数据开放支持，鼓励龙头企业牵头搭建产业协同平台。企业应积极对标行业标杆，参与示范项目，探索供应链数字化与绿色管理应用，提升数字技术在高端环节的应用。

政企协同发力构建“资金—服务—平台”一体化支持体系，为长沙市企业数字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政府应设计多层次财政金融支持工具，例如对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专项补贴与税收抵扣，对重点企业提供低息“数字转型贷”，同时依托本地高校与律所建立公益性技术、法律咨询服务站，并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共建开放性的行业数字创新平台。企业需系统梳理自身需求，主动对接使用的政策资源，积极利用公共平台资源开展协同研发与技术攻关。

政企协同强化 AI 技术、数据与人才支撑，切实推动数字创新深度融入长沙重点产业价值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筑可持续的数字创新生态。政府应结合工程机械、新材料等长沙重点产业，牵头搭建“智能制造 AI 开放创新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的模型工具与算力支持。同时，安全有序开放部分公共数据资源，推动数据合规共享，并推出“数字星沙人才计划”给予专项奖励。此外，可遴选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总结推广其在 AI 应用、平台搭建等方面的经验。企业则需主动推进 AI 场景落地、参与数据协同网络，并完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与政府一起共同打造良性发展的数字生态。

参考文献

- [1] 杨玉敬. 数字创新韧性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检验 [J]. 统计与决策, 2025,41 (16):105-110.
- [2] 甄俊杰, 师博, 张新月. 中国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及动态演进预测 [J].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 (03):3-20.
- [3] 丁仕潮, 张飞扬. 数字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评价与动态演进 [J]. 统计与决策, 2023,39 (14):109-113.
- [4] 徐君, 姜莉, 蒋雨晨. 数字创新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对策研究 [J]. 青海社会科学, 2022,(01):98-105.
- [5] 宋洋.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12):105-112.
- [6] 程显宏, 姜国刚.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4,(04):45-50.
- [7] 郑浦阳, 任道纹, 牛君, 杨广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J]. 统计与决策, 2024,40 (23):86-90.
- [8] 李佳慧, 杨起鸣. 数字经济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J]. 中国经济问题, 2025,(04):53-69.

引用本文 田晖, 朱璐, 黄哲. 长沙市企业数字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调查问卷分析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6, 8(1):20-29.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202>.

Cite This Article Hui TIAN, Lu ZHU, Zhe HUANG.(2026). Analysis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rvey of Enterprises in Changsh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8(1):20-29.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202>

Analysis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rvey of Enterprises in Changsha

Hui TIAN, Lu ZHU, Zhe HUANG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enterprises in Changsha, this study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enterprises' awarenes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digit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ffects of applying digital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on economic quality, enterprises'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al measures for further adopting digital innovation. Based on 635 valid respons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remains at an early stage,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AI in practical scenarios; talent shortages and weak technological adaptability are the main constraints. Enterprises demonstrat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support policies, with generally positive evaluations yet concerns over insufficient policy promotion and complex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heir percep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ligns with policy objectives, often pursued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nd talent recruitment. Digital innovation shows notable effects in production intelligence and decision optimization, while its role in promoting value chain digitalization requires further enhancement. Enterprises mostly expect financial support such as technology subsidies and tax reductions. Future plans include adopting AI models,

building intelligent platforms, and introducing skilled talent to deepen digital innova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facilitate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Changsha; enterprises; digital innovati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